

容閔不是近代 中国資產階級改良主义者嗎？

——兼論改良派与洋务派的性質及其关系

张 其 光

容閔（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年）是不是近代中国資產階級改良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見解。我认为容閔是早期改良主义者。（見《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拙著：《容閔〈教育計劃〉的实质及其影响》）有人认为“容閔不仅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工具，而且是封建統治集团的洋务派的重要角色。”（見上海《文汇报》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王永康：《容閔是近代中国資產階級改良主义者嗎？》）討論一下这个问题，对于评价容閔这一历史人物固然是必要的，就是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上改良派与洋务派的性質及其关系也很关重要，特别是对于許多早期改良主义者的评价問題关系更大。

为了考察容閔是不是早期改良主义者，还是先把近代中国改良派和洋务派的性質及其关系作为前提問題加以探討。

近代中国的改良派和洋务派，有区别，有分歧；又有联系，有共同点。特别是早期改良主义者与洋务派的界限在洋务运动初期还很不分明，他們之間的分歧随着洋务派的买办性日益加深而逐步暴露出来。

中国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階級基础是当时部分的开明地主和中等資產階級，洋务派的階級基础是部分的大官僚、軍閥、大地主以及由他們轉化的买办資本势力；他們都同是剝削階級，都和劳动人民相对立，都反对革命、或不要革命，因而都必然失敗、必然破产，事实上他們都已在中国近代史上失敗和破产了。

近代中国改良派和洋务派都是中国封建社会轉变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的产物，亦即是在外国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疯狂侵略遭到中国人民坚决反抗，而封建势力逐步勾結帝国主义繼續鎮压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严重階級斗争中的产物。改良派代表着开明地主和新兴的中等資產階級的利益，希望緩和国内階級斗争，企图在不根本动摇封建主义社会基础的前提下进行从上而下的温和的政治改革，主张学习西方，提倡西学以培植人才，兴办实业以发展資本主义經濟，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起过一定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作用。他們抱有狹隘的爱国思想，提出“以夷制夷”、“师夷制夷”，但对

帝国主义又抱着极大幻想，非常缺乏反帝斗争勇气。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势力逐步高涨，改良派就坚决反对革命，成了反动派。而洋务派却是首先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起家”，早已成为反动派。他们奉承封建地主阶级当权的顽固派，又勾结帝国主义，逐步地成了当权的反动派。他们当初也曾受到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曾意识到封建主义的统治危机，便利用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标榜“安内攘外”，“自强求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船坚炮利，抵御外侮”等等，来进行他们卖国求荣致富的罪恶事业。可是，洋务派的买办性和卖国阴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所以早期改良主义者也曾受到洋务派的影响，对洋务派抱有极大幻想，甚至参加了洋务运动，做过洋务派官僚集团的“幕僚”，起过“参谋”、助手作用。早期改良主义者这样依附洋务派，是由于他们本来是地主、商人或官僚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有些人本身就是地主、商人，更多的人中过科举，他们在政治上带有很大的投机性和依附性。更根本的原因，乃在于这些改良主义者所代表的部分的开明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与洋务派所代表的部分的大官僚大地主以及由他们转化的买办资本势力之间存在着经济联系和思想联系。这些早期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也有着社会联系，因而发生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以至“合作”，实际上不过是改良主义者依附了洋务派。

那些依附过洋务派而没有改变改良主义思想和要求的人物，毕竟还是改良主义者。把所有参加和赞助过洋务运动的改良主义者一律看作洋务派，并与真正代表部分的大官僚、大地主以及由他们转化的买办资本势力的洋务派主要人物混淆起来，显然是很不恰当的。既然早期改良主义者和洋务派互有联系、互相影响，加以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的买办性还未显露，他们与改良主义者之间的界限自然很不分明，容易被混淆起来。正因为这样，特别需要作具体考察具体分析，才能发现他们之间同中有不同（在初期比较相同，逐渐显得不同或很不同），才能了解他们两者在性质上和关系上的变化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只强调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分歧，不注意他们曾经合作，关系异常密切，而把他们看成是两种绝对对立的政治势力，也是很不妥当的。事实上，早期改良主义者参加了洋务运动，在表面上看来，也可以说是参加了洋务派，叫作“一身而二任”也可以；但必须肯定：只要他们没有改变改良主义思想和要求，就依然是个改良主义者。

改良派作为一种挽救封建统治危机和民族危机，要求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思潮，开始发生和传播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以龔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扩展成为比较广泛的思潮，由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这时期的改良主义思潮的爱国思想比较突出，以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为主要代表，被称为早期改良主义者。洋务运动也正在这一时期兴起，所以早期改良主义者同洋务运动有密切关系，大抵成长于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利用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首先提倡的“以夷制夷”、“师夷制夷”的主张来办“洋务”，踏上买办资产阶级的进程，又利用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采西学议”，学习西方的要求加以“折衷”，成为“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早期改良主义者和洋务派合流了(有些改良主义者又从洋务运动中“孵化”出来)。尽管这样,他们之间的阶级基础、政治要求和思想倾向,毕竟存在着分歧的。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才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黄遵宪、唐才常等进行变法维新运动,形成了一个带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保国会”,才有比较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比较完整的政治纲领。这时候洋务运动已经破产,才显得改良派与洋务派的重大分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了。上述几批改良主义者,可以统称为改良派,但有早期与后期之分,后期改良主义者也有左派、中派、右派之别。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的阶级基础、政治要求和思想倾向,是大体相同的,但也不完全一致,在具体的主张上就不仅不尽相同,有时很有区别。因此,只能根据他们的阶级基础、政治要求和思想倾向的基本方面来鉴别和论断他们究竟是不是改良主义者,而不能以某些个别的具体主张、“具体对策”的有无或分歧作为鉴别和论断的“标准”。早期改良主义者本来就没有成熟的思想体系,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政派,如果拿所有的改良主义者——或一般的改良主义者所有具体主张作为“标准”,来鉴别和论断他们,无疑是不恰当的,不会符合客观历史情况的。

絕大多數的改良主义者都是知識分子,他們是皮上生长起来的毛,本来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随着階級关系的轉化而轉化,逐步向資產階級轉化,这就决定了他們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又帶有“先天”的依附性。他們有着追求救国真理的愿望和热情,有着政治社会理想和政治冲动,但他們軟弱无力,又不依靠人民群众,老想依附和利用某种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所以他們投靠这个,投靠那个,这是他們沒有出路的“暫時去路”。他們有时被欢迎被利用,有时被冷落被撇开;他們有时坚持有时妥协;有时起劲有时消极;这就是他們的特性。当我们考察他們的时候,必須十分注意他們这种特性,应该作“一分为二”的辯証分析,然后把握他們的思想和行动的主流或主导方面,才能如实地鉴别和论断他們是否还是改良主义者。

二

要論断容閔是不是改良主义者,就得具体考察容閔与洋务派的关系;而在考察这个关系之前,又須首先考察容閔未和洋务派发生关系之前是个怎么样的人物,是否已經是个改良主义者。我們不要割断历史,也不要割断容閔的历史。

容閔未投靠洋务派之前,已經成为一个早期改良主义者,他抱着改良主义的理想、要求和具体主张,去进行投靠太平天国的活动,投靠不成,才又抱着改良主义的計劃轉而投靠洋务派。这是研究容閔很重要的一个問題。

在早期改良主义者之中,容閔的家庭出身比較貧苦。他生长在南方华侨商人众多的广东(澳門附近),儿童、少年时期得到外国教士和商人的“帮助”,在澳門开始接受西方資本主义教育,于一八四七年(十九岁)去美国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又是第一个半工半讀、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在美国的中学和大学受了八年教育,后来

又入了耶教，同美国人結了婚，深受資本主义思想和生活的影響，而很少受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思想和习惯的薰陶。

他在美留学期間产生了爱国思想，他說：“予当修业期內，中国之腐敗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尤甚，每一念及，輒为之怏怏不乐……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于是产生了借西方文化学术来进行教育救国的思想。（見容閔《西学东漸記》第二十六頁——下引同书只注頁数）从此酝酿他的《教育計劃》，“以西方之学术，灌輸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第二十七頁）想以此来挽救“中国的腐敗”，和解除“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容閔之所以成为早期改良主义者，其出发点就在这里。

容閔于一八五四年“学成归国”，一八五五年回到广东，目睹人民惨遭杀戮，激发了强烈的政治冲动：“予自刑場归寓后，神志懊丧，胸中煩悶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間所見种种惨状，时时纏繞于予脑筋中，憤懣之极，乃深恶×人之无状，而許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予既表同情于太平軍，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及后深思熟虑，乃覺此举凶莽……不若仍予旧有計劃……循序漸进……庶可达予夙昔之希望也。”（第三十七頁）这时他徘徊于“革命”和“改良”之間，但終于选择了改良。但他比馮桂芬前进了一大步，馮桂芬主张“夷务第一，剿賊次之”，容閔却明白表示同情太平天国。又比之另一个改良主义者王韜主张“当今要务，平賊为先”，首先向上海当道清軍献策組織洋枪队由外国軍官領队“剿匪”，后来才上书太平軍將領逢天义刘大人献策，被清朝发觉，便借英領事保护逃去香港，則容閔的反复也算較小了。

一八五六年容閔到上海任海关翻譯处譯員，四个月便辞职，轉入英商絲茶公司任书记，为时六个月。此后数年四次失业，学习汉文，从事翻譯，又与华商接触較多。一八五九年接受洋商委托两次到产茶地区調查和采购。一八六〇年进行对“太平軍之訪察”，于是年十一月到了南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七項建議：“一、要求組織‘良好軍队’；二、設立武备学校；三、建立海軍学校；四、建設善良政府；五、創立銀行制度；六、頒定各級学校教育制度（以耶教聖經为主課）；七、設立各种实业学校。”（节自第六十六頁）其中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几方面的主张，大体上体现着改良主义的要求。

容閔建議“七事”未被太平天国采納，他很失望，感到太平天国“全不足恃”，“无有創造新中国之能力”。（湯志鈞在《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提到容閔“輕視农民革命政权”，其实也須具体分析，他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而作怎么样的“輕視”，都不是不值得研究的。）虽然洪仁玕挽留他，但他由于实行他的計劃沒有希望了，終于决計离去。后来容閔对太平軍依然加以頌揚，对洪仁玕、李秀成、陈玉成也曾推崇。他认为洪仁玕“即較洪秀全之見識亦略高一筹”。直到一九〇二年，华侨商人謝日昌等和洪秀全的从侄洪全福酝酿召集“洪門兄弟”，謀組“大明順天国革命新政府”，还“提議推举容閔老博士为临时大总统。”（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九十三頁和第四集第一〇七頁）这和容閔曾經訪問太平天国不无关系。

尽管容闳依附太平天国的活动没有成功，但应该看到容闳确曾企图凭借太平天国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和计划。这是容闳成为早期改良主义者很关键的一段过程。忽略这一过程的考察，便难于对容闳往后转而依附洋务派的前因后果作出比较确切的论断。

三

容闳依附太平天国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计划未遂所愿之后，于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三年在江西九江“自营商业”三年之久，及至一八六三年九月才和洋务派发生关系，开始依附洋务派，目的还是在于逐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计划。

容闳想利用洋务派实行他的改良主义计划，而洋务派却利用容闳替他们作“船坚炮利”、“自强求富”的买办。结果，容闳确实被利用了，积极替洋务派到外国购买机器、军火、甚至商借外债；而容闳的“教育计划”也曾因曾国藩、丁日昌的支持获得初步实行，派遣了第一批留美学生（其中包括詹天佑），但不到几年，终于受到李鸿章和吴子登的破坏而幻灭。从此以后，容闳和洋务派的关系就开始从良好到恶劣，其主要原因，就是容闳的改良主义思想毕竟同洋务派有分歧有矛盾。只要具体考察容闳与洋务派的关系的全部过程，就不会错把容闳当作洋务派的重要角色。

我们来较为具体地考察容闳和洋务派的关系的始末：

一八六三年九月间，容闳经曾国藩的“幕僚”张世贵三次函催，到安庆应曾国藩的“召见”。他说：张函“谓总督欲予弃商业而入政界，居其属下任事。予初不意得此机缘，有文正其人为予助力，予之教育计划当不患无实行之时，若再因循不往，必致坐失事机。”（第八十二页）容闳就是这样抱着凭借曾国藩的“助力”来实行他的改良主义教育计划的热切希望，开始和洋务派发生关系的。

容闳在安庆与曾国藩作了两次谈话。第一次曾国藩探问容闳是否“有志于军事”，他答以：“予于从军之事，胆或有之，独惜无军事之学识与经验。”（第八十五页）数日后作第二次谈话，曾问他：“若以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本想立刻提出他的“教育计划”，因事先察知曾国藩正打算筹办机器厂，而且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也希望发展机器工业，正是理所当然的，于是表示须先办机器厂，以迎合曾国藩，但他认为：“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创造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第八十八页）可见他们之间同中有不同。容闳接受了曾国藩的差使到英美购办机器，于一八六五年才回国，得到“嘉许”，“专折请奖”，“特授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之资格，在江苏行政署为译员。”（第九十七——九十八页）到了一八六七年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厂，容闳“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第九十九页）容闳这样着眼于“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在这一点上和洋务派是大不相同的。

接着，容闳借助于曾国藩的支持，又得了日昌的轉达，向清廷条陈“四事”，“一、中国宜組織一合資汽船公司，公司須为純粹之華股，不許外人为股東，即公司中經理職員，亦概用中国人……二、政府宜选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儲蓄人材……三、政府宜設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訴訟，以防外力之侵入。盖今日外人之势力之放恣，已漸有入中国越俎代謀之象……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节自第一〇〇——一〇三頁）这是容闳和洋务派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所提出的改良主义計劃。这次条陈“四事”和上次向太平天国建議的“七事”（相隔七年之久），都是研究容闳思想的重要材料，它鮮明地显示着容闳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主张。在条陈中強調兴办企业純集華人商股，不用外股外人，这能說成是“与改良派要求全由商民集股經營的思想有区别”嗎？容闳不仅这次条陈明确要求商股合資經營企业，直到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他在上海与一批商人商議并草拟《請創辦銀行章程》，仍然強調招收商股經營，并着重維護商股权益。虽然他也贊成“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但究竟与洋务派有所不同。当时中、小資產階級受到官僚資本排挤的情况下，有些改良主义者也贊成过官商合办，是从当时中等資產階級的現實利益方面着想，因为在他們看来总胜于被官僚資本完全垄断。从官办到半官办，官商合办，到官督商办，到商办自由发展，这正是当时中、小資產階級同官僚資本矛盾发展的过程，当然，其中也包括妥协的过程和分化的过程。容闳在这問題上是有妥协的，但不能說容闳贊成过半官办（官商合办），就同洋务派完全一致了。上述《章程》的第三項強調“权归总董，利归商股”，第十四項又說：“銀行买办向归大班所用；本銀行全属華股，总董全系華人，所有总分行买办，应由总董公举。”（上引《章程》見《皇朝經世文新編》卷十三，第二十四——二十五頁）容闳虽然这样強調商股經營、商股权益，但他又強調学取西方銀行的“法度”，“聘用有經驗之公正西人”，这正是改良主义者学习西方以致迷信西方的崇外思想，它不特沒有改变資產階級改良主义者的性质，恰恰是他們的特点之一。如果以为資產階級改良主义者絕不会迷信西方，絕不会引用外人，那就是“太理想的”、“太好了的”改良主义者了！那样的資產階級改良主义者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論者能够注意不要美化容闳这个历史人物固然十分應該，但也必須特別注意不要美化資產階級改良派。

容闳的条陈被擱置三年之久，直到一八七〇年冬才仅仅被批准了派送留学生那一項，又到一八七二年才开始派送，总算初步实现了容闳的“教育計劃”了。可是，从留学事务所設立的开始，就遭到頑固派的監視，以后便受到頑固派与洋务派的不断破坏，容闳虽曾作过不少爭持，卒之受到李鴻章和吳子登的打击而告終。自此以后，容闳与洋务派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他特別对李鴻章深怀不滿，他不是“批評”他，而是这样咒罵他：“設有燃犀之史笔传之，則其一生行为，如探海灯烛物，秋毫无遁形矣！”（第一〇〇頁）容闳虽然曾經錯誤地对曾國藩推崇备至，而在曾國藩死后对洋务派的第一号头子李鴻章却敢于作这样的責罵。后来另一个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写了《李鴻章传》，对这个卖

国賊之寬容甚至諸多頌揚，就不是容閔所期待的“燃犀之史筆”。在這一點上，容閔較之梁啟超又為如何呢？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容閔比梁啟超高明得多，而梁啟超較之容閔就不只后退了一大步。容閔責難李鴻章之嚴，難道只屬“私人恩怨”而主要不是政治觀點的分歧嗎？又且看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容閔與李鴻章的一段關係吧：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深重，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力主對日投降妥協，不斷進行停戰議和活動；而容閔力主繼續對日抗戰。他說：“戰爭既開幕，予之愛國心油然而生，乃連發兩書，寄予友蔡錫勇君……規劃戰事，可使中國可與日本繼續戰爭，直至無窮期而力不竭。”（第一三三頁）這又是容閔在中日戰爭問題上同洋務派的重大分歧。然而，當時容閔又錯誤地向張之洞提過建議：“……由中政府派員將台灣全島抵押於歐西無論何國，借款四萬萬美金，以為全國海陸軍繼續戰爭之軍費。”（第一三四頁）這種建議雖則目的仍在堅持對日抗戰，但也正是切合帝國主義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的陰謀，也正是切合以張之洞為首的江南洋務派官僚軍閥醞釀“東南自保”的陰謀。這種錯誤之所以產生，既是容閔對英、美帝國主義抱有幻想所致，也正是早期改良主義者“以夷制夷”的思想作怪。就是這樣的一個“以夷制夷”的建議，也被李鴻章否定了。容閔也就立刻遭到張之洞的“冷遇”，被派到劉坤一屬下當個“交涉委員”。容閔寫道：“不過三月之久，旋即自行辭職。……此三月內……無一事可為，不啻一挂名差使。此即予居張、劉屬下之短期經驗也。”又寫道：“一八九六年予與江南政界斷絕關係。”（第一三八頁）可是，往後容閔和洋務派倒有過一段更惡劣關係。那就是容閔籌辦銀行遭到洋務派盛宣懷的打擊和破壞，他對盛宣懷作過這樣的揭發：“此次銀行計劃，遂亦為盛之賄賂所破壞。有人謂盛宣懷此次來京，輦金三十萬兩，賄買二三親貴及政府中重大人物，以阻撓其事，於是籌備國家銀行之一千萬兩現銀，遂為盛一人攫去，以營其私業云。”（第一四〇頁）應該看到這種揭發不僅反映着容閔與洋務派的矛盾，而且反映着官僚買辦資本如何不擇手段侵奪民族資本（中等資產階級），從而引起容閔這個改良主義者的憤怒，還反映着這個改良主義者對於清朝統治集團的貪污賄賂成風的不滿情緒。

總之，容閔和洋務派雖然有過密切關係，但他們之間的分歧逐步顯示出來：容閔同情太平天國的態度，與洋務派頭子們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截然不同；容閔要求發展民族資本、商辦企業，與洋務派頭子們極力發展官僚買辦資本是有矛盾的；容閔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崇拜西方的思想也很濃厚，但愛國思想仍然很突出，與洋務派勾結帝國主義賣國求榮求富、犧牲民族利益的罪惡，是有區別的。

四

既有濃厚的崇外思想，又有突出的愛國思想，這是容閔思想上的矛盾，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早期改良主義者普遍存在着的思想上的矛盾，正是他們所代表的當時開明地主——特別是中等資產階級的精神狀態的反映。崇外思想的產生，一方面由於不滿封建主義統治腐敗，一方面羨慕西方文明，向西方尋求救國的道理和辦法。愛國思想則由於帝

国主义侵略日益疯狂、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所激发所增强。所以他們的崇外思想和爱国思想有着內在联系，有着一致性，又矛盾又并不完全矛盾。历史的发展，階級的要求，促使这些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爱国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

容闳对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态度，是否表现了爱国思想，也須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容闳既然在美国受到資本主义教育八年之久，回国后屡任海关、洋行的雇佣职员，又到外国购买机器、軍火，又当过留美学生监督和駐美副使，所有这些，可証容闳既深受外国資本主义思想影响，又曾与外国資本主义、帝国主义有过密切关系，这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另一方面，容闳在行动上言論上，特别是外交問題上所表现的爱国思想，也是应当被重視的。历史地全面地研究这个历史人物的政治生活和思想傾向，并把握其主流或主导方面，是个关键問題。

容闳的爱国思想确有經常的突出的表现，这是和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只是属于当时的中、小資產階級的狹隘的爱国思想。

除了上述他在美留学期間产生了爱国思想之外，他在“入世謀生”之初，接触了社会、政治实际，很快就憤恨貪污风气和外人特权。一八五四年他在上海海关任职仅四个月便憤而辞职，正是因为鄙視商人与海关“狼狽为奸，以图中飽”的賄賂貪污行为，又有感于“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終不可为总稅務司耶？”（第四一頁）在英商絲茶公司任書記的六个月期間，两次身受外国人的凌辱，他采取了自卫抵抗，拳打那个首先毆辱他的英国人。事后他写道：“盖自外人辟租界于上海以来，侵夺我治外法权，凡寄居租界之中国人，处外人势力范围之内，受彼族凌侮，时有所聞，然从未有一人敢与抵抗，能以赤手空拳，自卫其权利者，此实由于中国人賦性柔和，每受外人之无礼之待遇，輒隱忍退让，不敢与較，致养成一般无意識之外人之放恣，喧宾夺主，不复以平等遇我同胞也。”（第四十五頁）这当然不是正确的分析，他把外人恣意凌辱同胞归咎于中国人賦性柔和，显然不对。但这番話亦足見他当时确实反对治外法权，并鼓舞中国人要对外国人的欺凌敢于自卫抵抗。

一八五九年三月至十月，容闳到产茶地区采购茶絲，当然是替洋商服务了。可是，当他了解到一些对外貿易情况，便有感于从前湘粵人民尚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迨后外洋机械輸入，复經国际战争及通商立約等事，而中国劳动界情势乃为之一变，此不仅扰乱中国工业制度，且于将来全国經濟、实业、政治上皆有莫大影响也。”（第五十四頁）容闳这番慨叹无疑是对外国資本主义經濟侵略和不平等条約的訂立的后果表示了忧虑。

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发生，容闳自述：当时丁日昌“电召予为譯員，电至略晚，未及与同行，予乃兼程赴津，抵津后尙得与聞末后数次之談判。”（第一〇五頁）究竟他在这事件上还起过什么更坏的作用，他自己沒有說，但从下面一番話也可以看到他对这事件的态度：“使予之教育計劃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是仇教之恶果，而轉得維新之善因，在中国国家未始非

塞翁失馬，因禍得福也。”（第一〇四頁）站在改良主義者的立場來看人民反洋教鬥爭的觀點就顯得很了，一方面害怕群眾革命力量，指責“仇教惡果”，另一方面抱定憑借西方文明來救國的幻想，學習西方迷夢方酣，不懂得“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的道理。

從一八七一年到一八七八年，容閔在美任留學生監督和後來兼任駐美副使時期，他的愛國思想也有所表現。

與秘魯專使談判招募華工訂約，和前往秘魯實地調查華工情況，容閔都沒有放棄愛國立場。關於談判經過，他說：“予奉命往見，秘魯專使顏色和霽，歷言華工在秘魯營業若何發達，秘魯政府若何優待，工資之優厚，為中國所絕無……云云，此種市言重甘之辭，在他人聞之，鮮不墮其銜中，顧予非其人也。……告之曰：販賣華工在澳門為一極尋常之事……此多數同胞之受凌虐，予固目擊其慘狀……予今日明白告君，君等幸毋希望予能助君等訂此野蠻之條約……”（第一一三——一一四頁）於是訂約不成。

及後容閔到秘魯調查，極力搜集虐待華工慘況。“予之（調查）報告中，另附有廿四張攝影，凡華工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傷痕，令人不忍目瞻者，予乃借此攝影，一一呈現於世人之目中。”“秘魯專使出（其）不意睹此真確可據之攝影，乃噤不能聲，垂頭喪氣而去。自予報告秘魯調查情形，政府遂以華工出洋著為禁令，豬仔之禍，乃不如前之甚矣。”（第一一六頁）

容閔從一八五五年在上海海關任譯員，到一八八一年解除駐美副使，歷時約二十五年，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幾達四十年，經常表現著愛國思想，特別是在外交事務中與他有直接關係的事件上，可以看到。當然，容閔不是積極參加反帝鬥爭的人物，到底缺乏反帝勇氣，因為他沒有和群眾站在一起作反帝鬥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勇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只能是膽怯的改良主義者。

五

毛澤東同志科學地全面而深刻地論述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两重性。他指示說：“民族資產階級是帶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又受封建主義的束縛，所以，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矛盾。從這一方面說來，他們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國革命史上，他們也曾經表現過一定的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積極性。”“但是又一方面，由於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繫，所以，他們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這種情形，特別是在民眾革命力量強大起來的時候，表現得最為明顯”。“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重性，決定了他們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夠參加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他們可以成為革命的一種力量。而在另一時期，就有跟在買辦大資產階級後面，作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險。”（《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二卷，第六一〇——六一一頁）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民族資產階級在极薄弱的經濟基础上开始逐步形成，是在中国从封建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轉化过程中逐渐形成起来的，历史条件决定它的两重性——階級关系、政治、經濟关系决定它的两重性。作为中国民族資產階級的两种政治代表、思想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都帶有他們本階級所賦予的所規定的两重性；但又有所不同：革命民主主义者还要革命（虽然是不彻底的革命），改良主义者却不要革命。所以，改良主义者的軟弱性、动摇性、妥协性、投机性和依附性更为严重，他們“跟在买办大資產階級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更大得多。近代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軟弱性、妥协性和依附性特別厉害，这是他們只代表一部分开明地主和商人剛轉化过来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薄弱和政治上很不成熟所决定的，还因為他們自身的知識分子特性所决定的。所以，这些改良主义者当中有不少人参加了洋务运动，“跟在买办大資產階級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的可能就变成了现实。这样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仍然和代表官僚买办势力的洋务派有着分歧，在政治上思想上仍然是个改良主义者，容閔就是属于这种人物。

关于早期改良主义者和洋务派的关系及其区别，胡绳同志作过确切的論述：“近代中国第一批的改良主义者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狂潮下产生的，在他們的思想中深刻地表現了这个特性（引者按：指既有反帝爱国思想情緒而又胆怯得很的特性）。他們多半还是出身仕宦之家，而且自己也博得一官半职，他們同办‘洋务’的大官僚关系常很密切，他們思想上却有若干区别。办‘洋务’的大官僚以既存的条約下維持‘和局’为滿足，而这些改良运动者看出这种条約对于中国是种鐐铐；洋务官僚以为只要有官督商办的工业和使用新枪炮的軍隊就够了。而这些改良主义者却漸漸地，虽然用着极其胆怯的口气，透露出了进一步地自由发展民間企业的要求乃至政治要求了。”（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容閔便是这些改良主义者当中比較突出的人物。

基上所論，容閔虽曾参加洋务运动，与洋务派有过密切关系，但仍然具有爱国思想，还要求发展民間企业，要求实行他的“教育計劃”来使“老大帝国成为少年新中国”，直到戊戌变法維新运动时期还参加唐才常等发起的自立会，被推为中国国会会长（严复是副会长），卒致清朝統治者和张之洞都要緝捕他。他在离国赴美之前对友人說：“予老矣，此去終老美邦，再見实难……予默察現時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誠以授汝，汝其闡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則死，民有气則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納民气于正軌，此中国少年之責也。”（刘禹生：《世載堂杂忆》第一一四頁）这番話，既肯定义和团是“民气”，又希望所謂“納于正軌”，便活現一个近代中国資產階級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灵魂。

1964. 1. 29. 于广州